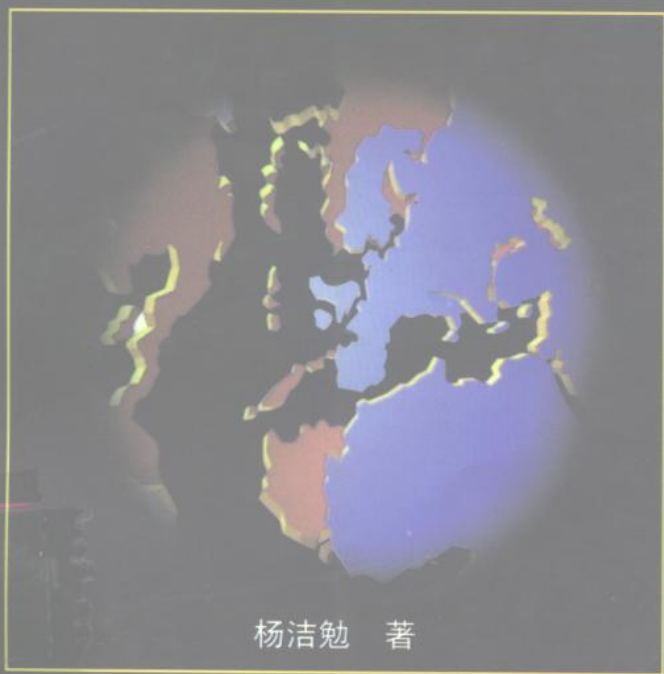


后冷战时期的 中美关系 分析与探索



杨洁勉 著

HOULENGZHANSHIQIDEZHONGMEIGUANXI
FENXIYUTANSUO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后冷战时期的 中美关系 分析与探索

杨洁勉 著

HOULENGZHANSHIQIDEZHONGMEIGUANXI
FENXIYUTANSUO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陆宗寅
封面装帧 陈红萍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

杨洁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75 插页 5 字数 172,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710-2/D·498

定价 12.00 元

序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双边关系，其影响超出两国、乃至亚太地区，其走向更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后，尽管还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基本上沿着健康的轨迹运行。

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充满曲折的进程中，艰难地重新界定相互关系的基础和行为准则。美国始则藉 1989 年 6 月的北京政治风波而对中国无理实施“制裁”，继之在人权、贸易和军售问题上施以重压。特别是在美国出尔反尔地同意李登辉访美之后，两国关系再次陷入低谷，严重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在中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和中国经济近年的崛起，美国承认了中国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提出了“建设性的全面接触”政策，但仍有一些美国人士至今还在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念念不忘“遏制”中国。

中美关系事关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全局，三代中央领导都十分关注并亲自指导。当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在后冷战时期的最初震荡中，邓小平同志曾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指示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中美关系遇到严峻

考验时,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基本方针。这样,中美关系得以不断排除干扰,在曲折中前进。

处理后冷战时期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需要英明领导与具体实施,也需要参谋咨询。我国的国际问题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的辛勤劳动已为改善和推动中美关系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战略指导。在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蕴含着国际问题部分,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对中美关系都有详尽的阐述。因此,在国际关系学科中进一步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正确阐明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趋势,有机地将国家利益和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透过纷繁的现象抓住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及时的。同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社会科学不能在实验室中发现定律或证明理论,只能在瞬息万变中进行不懈的系统探索,而中美关系是研究其典型的事例,其魅力也正在于此。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涉及到当代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我们鉴往知来,廓清前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使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超越肤浅的叙述,而达到深层的理解和分析。

中美关系集中反映了两个世界大国在时代、格局、秩序、形势、战略、政策、外交、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异同。国内各界对中美关系有各种意见。作为研究工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分析。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

对于上述各点,杨洁勉同志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努力贯穿始终,因此成为该领域中较为突出的中青年学者。近年来,洁勉同

志无论在美国大学授课，还是在国内研究，专注于该课题的研究。在进行大量艰苦的学术研究的同时，杨洁勉还同美、欧、日及东南亚的各界人士保持广泛联系，交流切磋。他的研究成果因其材料扎实、观点鲜明和见解独到而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好评，而《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则汇集了他近年来论文和演讲的精华部分，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语）。我相信，《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分析与探索》一书的问世，将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同时，我希望洁勉同志继续努力，今后有更多的力作问世。

汪道涵

1996年秋于上海

前 言

当人们已经可以日益感觉到 21 世纪来临之时,当世界各国正在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多极化的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大变动之时,当亚太地区正以政治和经济崛起而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时,很有必要对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作一客观回顾和认真总结。

总结历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本质和把握它的发展趋势。1784 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在美国建国后不久首航中国,拉开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序幕。但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的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 60 年代末,中美两国基本上处于敌对的状态。直到 1969 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中美关系解冻后两国关系才逐步走上正常和健康的轨道。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世界开始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过渡,中美关系随之也经历了历史性的震荡。首先,前苏联的消失,使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发生变化,两国必须重新界定新的相互关系准则。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关系主导思想常徘徊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对华目标则游弋于价值观念和实际利益之间,对华政策则交替使用强压和利诱。在对中国的战略地位的评价问题上,美国也是先倨后恭,最后在事实面前被迫承认中国的作用和地位,但它对中国的戒备也有所增加,

这就是某些美国人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背景。

其次，在后冷战时期应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两国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试图继续维护它的“领导”地位，并以有利于其的“国际行为规范”套住中国。而中国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并提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进行和中美关系日益受制于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在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东盟、西欧等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在中国“复关”和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申办 2000 年奥运会、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全面禁止核试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问题上，中美两国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斗争的一面。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美两国在多边关系上的互动还会增加。

第三，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逐步同战略因素一道成为中美关系的最主要的支撑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自身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中美经济合作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甚至超越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困难。当然，日益密不可分的两国经济关系也产生了众多的矛盾，由于它同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双方让步的幅度有限，因此经常在市场准入、贸易赤字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摩擦不断。总之，经贸因素已成为中美关系合作的推动器、摩擦的发生乐器和下滑的制衡器。

第四，意识形态因素的特殊作用。美国堪称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条件和机遇，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不断取得“成功”，美国政府和人民中普遍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外输出“美国模式”。特别是前苏联垮台后，美国朝野一时纷纷弹冠相庆，以为世界主义和制度之争的“历史已经终结”，因此对仅剩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既可以颐指

气使，又必欲早日“西化”而后快。近年来，又有美国学者提出了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理论。因此，如何在双边关系中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将是两国政府面临的长期任务。

第五，中美关系向为两国政府所重视，并由其主要领导人直接掌管。中美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文化独特，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潜力。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双边关系的好坏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两国，而且对两国所在的地区（如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和格局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美国布什总统当年就十分关心对华政策的实施，克林顿总统在首任执政期中也逐步认识到其对中美关系的注意不够。邓小平同志为中美关系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则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基本方针。这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指导思想。

对国际关系趋势的判断往往因为变数实在太多而相当困难。但是，就中美关系而言，它又具有一定的可测性，因为中美都是大国，政治目标明确，外交比较成熟，经济走势清楚，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又举足轻重。当然，预测同今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吻合，但对其作个梗概性的描述既是可能的，也是很必要的。从时间长度来说，此处所谓的“今后”系5—10年的中期而言。短了，这些预测恐怕还未成书发行就已失去时效；长了，则作者恐不能胜任。

作者对中美关系前景持乐观态度。尼克松访华和邓小平访美所形成的两次蜜月时期已属过去，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将大为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的中美关系更具大国间正常关系

的普遍性。既然中美关系经受住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代之变(如从冷战时代转变到后冷战时代)的考验,既然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这样重要和敏感的斗争中能做到“斗而不断”,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今后将继续在曲折中前进。

同时,我们又要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困难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一大障碍。一方面,美国政府表面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国会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仍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与台湾关系法”等,凌驾于“三个公报”之上。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言行不一,不断提升美台关系,增加售台武器,鼓励台湾与大陆“不独不统”的局面,不时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搞些小动作。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香港、西藏、南中国海岛屿的归属问题,都有冲击中美关系的可能。

中美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从理论上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挑战,这里不仅有如何评价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及各种派生理论;也有如何看待“相互依存”和“双赢”等新观点;而且还有在时代、格局、秩序、民主、人权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努力超越就事论事,尽量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和分析问题,但这显然还是个尝试。

冷战结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刊物和国际国内会议上发表了近百篇的论文,现择其要者汇集成书,以飨读者。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曾主持过不少学术研讨会和同国外有关人士进行过交流、乃至交锋,因此特列选其典型者以力求全面反映作者的研究工作。全书分为“国际格局”、“亚太形势”和“中美关系”三编,各编内的文章按写作时间程序排列。为保持论文的本来面貌,在编辑中对各篇均未作任何修改。

本册论文成稿以来,世界和中美关系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作者的有些论点并未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但所幸的是,作者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观察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如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基础、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辩证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特征、研究中美关系必须置于国际和区域的总体框架中予以考虑等。毋庸讳言,国内外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存在不少分歧,作者尽可能在研究工作中努力争取做到科学客观,直抒己见。熟悉其背景的读者不难理解其中之甘苦。

本书得以刊行,离不开众多学术界和外交界前辈的指点和同行们的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对学术著作的大力扶持,编辑和文秘人员的辛勤劳动,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当然,书中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均由本人负责,也请各位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杨洁勉

1996 年仲秋于上海

目 录

序.....	汪道涵	1
前 言.....	杨洁勉	1

第一编 国际格局

“雅尔塔体制”和新旧国际秩序交替(1990年8月25日)	3
试论国际秩序的运行机制(1991年7月)	7
大国关系和中美关系(1996年6月8日)	22

第二编 亚太形势

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相互作用(1989年春)	29
90年代美国在东亚的战略(1991年4月)	42
调整中的美国亚太政策(1993年9月3日)	61
亚太经济安全合作刍议(1995年7月6日)	74
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国际关系(1995年12月)	88
考虑亚洲安全勿套单一模式(1996年3月29日)	121

第三编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症结与对策(1991年12月)	127
----------------------------	-----

克林顿对华政策的特点和中美关系走向

(1993 年 4 月 30 日)	142
中美关系风雨 50 年(1994 年 9 月 5 日)	156
改革开放、对外战略和中美关系(1994 年 9 月 24 日)	164
李登辉访美与中美关系(1995 年 7 月 13 日)	172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经济战略和中美经贸关系	
(1996 年 4 月 25 日)	178
大选年的中美关系(1996 年 6 月)	189
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政策(1996 年 8 月 25 日)	196
克林顿新政府的外交走势(1997 年 1 月)	206
中国对美政策的调整(1997 年 1 月)	214
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 25 周年(1997 年 3 月 2 日)	225

第一編

国际格局



“雅尔塔体制”和新旧国际秩序交替^{*}

(1990年8月25日)

1989年来,东欧不少国家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华约名存实亡,德国迅速走向统一,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趋向消失。欧洲风云急骤,亚洲也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国际关系变化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全局的性质。这些意味着战后国际关系史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维持了45年的雅尔塔美苏两极体制正在被打破,新的多极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形成。

所谓“雅尔塔体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美、英领导人举行的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11日)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对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安排。其中雅尔塔会议最为重要,故名。“雅尔塔体制”既确定了美苏主宰战后世界的精神和原则,又具体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这三次会议,把欧洲一分为二,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欧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德国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战后发展成为东、西两个德国。在远东,苏联承认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以及在中国的利益,美国则满足了苏联收回南库页岛、取得千岛群岛、外蒙古独立、以及把中

* 这是作者在上海学者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国的大连港国际化、旅顺港租让给苏联为海军基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等要求。“雅尔塔体制”还包括建立联合国。朝鲜按“三八线”分为南北两方虽不是上述会议决定，但也可视为“雅尔塔体制”的延伸部分。战后的世界就是在“雅尔塔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峙和合作的两极格局。

“雅尔塔体制”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反映战胜国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对维持战后世界国际关系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一方面，它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战后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并相应划分了势力范围（对中国的势力范围划分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消失），形成较持久的均势，各大国都竭力保护这一体制。另一方面，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比，“雅尔塔体制”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战败国问题，使得战败国长期以来成为维护这一体制的力量而没有走向反面，尽管战后 45 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危机时有爆发，资本主义国家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但世界格局仍基本稳定。但是，“雅尔塔体制”表现出来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总体精神和原则，是与 19 世纪初叶以来先后出现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一脉相承的，仍是一种大国强权政治，并伴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它所确立的两极格局虽然防止了“热战”的爆发，但也导致了一种不断升级的“冷战”态势的出现。

战后 45 年来，“雅尔塔体制”受到多次冲击，逐渐削弱，如 1948 年的柏林危机和 1950～1953 年朝鲜战争等。特别是 1948～1949 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破裂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美苏势力的范围内打开缺口，削弱了“雅尔塔体制”。从“雅尔塔体制”的精神实质来看，“雅尔塔体制”的消亡过程是从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开始的。当时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初见端倪，其突出表现在中苏分裂、美法矛盾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此后，以苏美